

初抵美國

當時要飛往美國主要都是透過 C A T，中譯叫中國民運航空公司，是以飛虎隊為前身所組成的英國公司。該公司沒有幾架飛機，有一次該公司的一架民航機在林口發生空難，整個公司就馬上



筆者1960年代照片。

改組成運貨公司，等於公司關門，這彰顯了該公司沒幾架運人的飛機。捨去 C A T，剩下的就是西北航空公司，西北航空取道日本而飛往美國西岸，再接飛到東岸的華府。

我要在此強調，那時買的機票是單程的，機票當時算貴，單程要六百多美元，這票價在這四十多年以

後的現在並沒有改變，反而便宜一點。但六百美元我當時也拿不出來，只好向岳母暫借。

那時出國赴美沒有那麼簡單，我拿的是學生簽證，而且要有醫生的證明沒有香港腳，還有 X 光片一張證明沒有肺結核。所有往美國的學生皆人手紙筒一個，裡面裝有 X 光片一張。

那時也沒有桃園國際機場，故如果要坐飛機出入國，一定要經過松山機場。家裡的母親和兄弟姊妹，以及惠美的家人皆來機場送行。這也難怪，我這一趟出國，何時再回國是難以預料的。

經過不曉得多少時間，終於到了華府，哪裡知道華府的機場不是僅有一座而有三座，我飛抵華府的並不是哥頓教授所猜較常用的杜勒斯機場，而是位於華府與巴爾地摩中間的機場。就這樣，接我的人就在幾十英里外的機場等候，而我卻在陌生的美國華府附近向著喬大前進。

到了美國之後，我立即發現我們在英文課所學的英文並不管用，譬如說，我想坐的巴士的車資是每人一塊二十五分美元，但美國人硬是不說二十五分，而說四分之一元！他們不說“one dollars and twenty-five cents”，而習慣說“one and a quarter”。

後來有一次喬大一百五十年歷史的舊大樓要從華府的第十三街搬到二十三街的新大樓去，那時我已經在喬大，每一位教授（包括助理教授以上）都要提出所需的設備清單一張。結果我們的主任

把所有教授的要求加起來，發現比學校當局給我們科裡的預算超出很多，於是有一天把我叫去，要我將這些東西分為三類列出，即：“things you got to have”、“things you have to have”、“things you would like to have”。弄得我查遍字典也查不出“got to have”和“have to have”的不同點，只好去問美國人同事，這才弄清楚這兩者的不同。台灣英文課本所講授的英文裡沒有類似這種英文的實用例子，是一大缺失。

言歸正傳，我坐了灰狗巴士從機場抵達了第十街的巴士終點站，旁邊有一個黑人司機穿著制服，我一下車就用我生硬的英文問：「到十三街喬大的醫學院要怎麼去？」結果那黑人司機說搭計程車最安全！我就只好坐了計程車。其實巴士的終點站離喬大醫學院的路程很短，但我行李多也是非坐計程車不可的理由之一。

我在喬大醫學院位於十三街的辦公室認識了我的指導教授羅賓斯教授(Mary Louise Robbins)。她的人不錯，但沒結婚，已經是六十歲左右的女士。初次見面寒暄之後，她也把事務性的事交代清楚後，我這才明白，學校已經幫我安排了位在二十四街的學生宿舍，於是我便住進了學生宿舍。

——哥頓教授的家員——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我依約到了郊外的NMRI與哥頓教授見面。在會談當中，哥頓教授重申之前的承諾，說明喬大的安排只是暫時的，只會維持一年，第二年就會成為NMRI的公務員。

臨走時，他發現我穿的風衣太薄，不足以禦華府之寒，於是他吩咐他太太瑪琍隔天早上帶我去買大衣。那時的物價低廉，我衣袋裡只帶了二十塊美元，希望瑪琍夫人等會兒帶我去的地方東西不要太貴。結果她車子愈開愈是郊外，最後在舊衣店前停車，她下了車就帶我進去一家舊衣店，幫我物色適當的大衣。結果我找到合適的一件，等我買單時，我赫然發現這一件大衣的價錢是七毛五美元而已。弄得我數年後家計好一點，雖買了一件更好一點的大衣，也不敢穿它到哥頓教授家裡。

哥頓教授有一華人助手名叫關小姐(Alice Quan)，上文已提過，關小姐能毫無障礙地操廣東話，但中國普通話，即國語則一竅不通。一九六三年有一天，我趁她在抽氣櫃內滅菌做事時，請教了她該如何準備一套家具，因為一九六四年惠美與岫清到美國，我非得把家裡的必需品準備好不

Oct. 11, 1973
 Dear Amy ^{and} Kun-yen,
 Francis and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for
 the lovely evening we
 spent with you and
 that delicious dinner!
 We have been working
 hard to get ready to go
 next week and hope to
 make our deadline.
 We look forward to
 having you and the
 girls visit us in London.
 We might even find some
 Chinese food to make you
 feel at home. With Love
 and Best Wishes from us
 both - Sincerely, Mary

哥頓教授的夫人，Mrs. Mary Gordon寫給筆者的信。

行。但我在美國卻依親無著，對如何開始著手毫無概念，只好請教關小姐。

美國海軍實驗室因為寬敞，哥頓教授當時坐在另一個無菌抽氣櫃操作檢體，因此把我和關小姐的話都聽進去了，也知道了我的意圖。等我和關小姐的話講完走出實驗室之後，哥頓教授走過來與我肩並肩；他跟我說明，美國的家具很貴，而且我又不是要永久住在美國，他打算將他家裡儲藏室中上一代留下來的家具整理一下，湊成一套借給我用。總而言之，他叫我不再去買家具。我心想他老人家怎麼能搬這些家具到我住處，但我對住美國沒有經驗，故他有什麼方法也不太清楚，但我還是決定等等看。

等到惠美將到的前兩天，哥頓實現了諾言。原來我租下等惠美的公寓叫普克丘(Pooks Hill)。普克丘到美國海軍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有交通車可乘；哥頓教授有三個男孩和一個女孩，最小的男孩子當時約二十歲，叫比爾(Bill)，哥頓教授與比爾借了一部由自己駕駛的DIY的U-haul，而且以他的高齡卻親手與比爾一起搬了十件左右的家具到了普克丘。這些家具包括一張桌子、椅子、床等不打緊，還包括了一些廚房用具，真是設想周到。我自己呢？只添購了沙發椅一張及飯桌一套，前者是新的，後者是二手貨呢！另外懷斯教授也借給我一張小孩的床及零星的東西幾件，我全

家在美的生活是這樣子開始的。

惠美與岫清於一九六四年八月抵達位在維吉尼亞州的杜勒斯機場，當天的晚餐及飯桌都是哥頓夫人瑪琍打點、準備的。哥頓教授用他的車子把我們一家人送達我們在普克丘的新家，之後他吃了點東西就起身告辭了。我們請他把餐具放在原處就好，我現在還記得哥頓教授說：「保持一家的麻煩開始在整理餐具，而且它隨時都開始！」

哥頓教授與夫人瑪琍不但大方，而且幫別人忙設想周到。關於瑪琍尚有另外一件事現在還在我記憶裡，那就是內人懷雙胞胎的時候，有一次大雪剛過，普克丘公寓停車場地上一片結冰景象，內人準備送岫清到學校，走在薄冰上走時，忽然跌倒而出血。瑪琍知道後馬上燒好的晚餐帶來普克丘，使我們感動得無可形容，她發揮的是照顧人的本性，而我們就落在她這種精神的圈子當中。

哥頓教授借給我們的這些家具，終究來不及還，哥頓教授就辭世了。他留下不少小故事讓我回憶，但他與夫人瑪琍的人生結局卻不好。

——哥頓教授夫婦之死——

哥頓教授於一九七三年從海軍退休，退休後擬到倫敦的眼科學研究院繼續研究。那時我已是一個成家立業的喬大教授，所以他也請我寫了一封推薦信。我們一家人開了一個晚餐會，請了一些人歡送他夫婦倆。他因為生性喜歡某些程度的冒險，出發前告訴我，他這次行李特別多，所以預備到紐約搭客貨兩用的輪船橫渡大西洋。數天以後我們卻獲得噩耗，說他們夫婦乘坐的船著了火，他們逃上了救生艇之後，救生艇在大海中翻船而兩人都溺斃。他夫人瑪琍的屍體是找到了，但哥頓教授的屍體始終沒找到，他們倆的墓現在在馬里蘭州的Olney家附近的教會墓地內。

——懷斯教授——

話說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在海軍第二醫學研究院與哥頓教授見面時，他已經把我留美第二年以後的行程都已經安排好了。我的校外指導教授在海軍第二醫學研究院，是哥頓教授的副



懷斯教授與其夫人的合照。

手懷斯教授(Emilio Weiss)。懷斯教授出生在南斯拉夫，長於義大利，後來移民美國，他說一口口音很重的英文，但是研究論文卻寫得頭頭是道，是美國少數的立克次體及微生物的生化專家。我抵達美國當時，正巧碰到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威廉·文森(William Vinson)在沒有細胞的培養液裡成功培養出五日熱立克次體(Rickettsia quintana)。因此，微生物學界裡「五日熱立克次體不是典型的立克次體，立克次體必須重新分類」的聲音甚囂塵上，我的研究就是闡明五日熱立克次體的化學變化，從生物學的觀點看五日熱立克次體是否真的是 rickettsia。

懷斯教授的父親是一心理學家，曾從師於弗洛伊德，所以懷斯一家是科學世家。他特別相信愛因斯坦的一句話，即「聯想力比知識重要」，他每天都會告訴我：「崑巖，聯想！」那時喬大微生物學科有比利·翰(Bill Hahn)這個人，花了七、八年寫了四百頁長的論文拿了博士學位而畢業。當我以三年的時間寫了七十五頁的短篇論文贏得博士學位時，懷斯教授曾經跟我說：「當你沒有東西好寫時，博士論文要四百頁，當你有東西寫時，寫七十五頁就行了。」由此可見他對論文簡潔的要求。

懷斯教授也把我當作很成熟的學生，他從芝加哥大學退休，有幾個好朋友還在芝大，我記得其中一位叫慕德(Moulder)，是專門於細胞內成長的生化家。每次慕德來海軍研究院，懷斯都要請他吃飯，由我作陪，我從他們的會談中學到不少事。

懷斯教授也是很實際的人，他曾經告誡我，週末離開家裡到實驗室工作，估計要花的時間記得要乘以二，比如說實際可能要花兩小時，告訴太太時就要說四個鐘頭，因為可能會有未能預料的事會發生。他也喜歡玩弄英文字，他指非驚天動地的研究不能接受的年輕人是患了“Nobelitis”，意思是指一個人患了諾貝爾獎金熱；感冒流鼻水，鼻涕擤不停的人叫“Blownosis”，這些新字都令人莞爾。

——雙胞胎的來臨——

一九六六年我獲得了博士學位，一九六七年、隔長女岫清出生五年之後，雙胞胎，即岫安與岫寧，終於來臨。那時我內人還沒有在美國就職，故全心照顧雙胞胎及長女。照顧雙胞胎不是那麼容易的事，首先，照顧的重點在尿布，我內人有數十條用紗布縫好、疊好的尿布每兩天要洗一次。另外，因為兩個雙胞胎很像，餵奶時很怕一個會餵兩次，而另一個沒餵到，故兩個雙胞胎各有豎牌編號，舉凡任何事情，例如拉肚子的是岫安或岫寧，都有詳細的記載，以免上述重餵、重做的事會再發生。這些都全靠我太太的點子多，所以帶起小孩來特別容易，等她們上學時，果然同一個人重複做兩次的情況就發生了。原來她們學校在休息的時間上廁所是叫名字、照排隊的，有一天，她們回來，有一個褲子是乾的，另一個卻是濕的，一問之下，乾的去過廁所兩次，而濕的一次也沒去過，因為老師沒叫她去排隊，可見老師沒有牌子。

但雙胞胎在醫學上有它的作用，對研究基因的影響特別有用，這也是希特勒手下的醫生們特別喜愛猶太人的緣故，看奧茨維堡的解放紀錄片最後的鏡頭，有一大堆猶太雙胞胎走出那集中營，就

知道雙胞胎在醫學研究上的價值。不說別的，光是觀察岫安與岫寧從學校帶回來的病毒，明明是當時流行的同一病毒，但她們兩個的症狀確有差異。這也證明世間要有醫師，因為診斷需要靠細心的觀察與聯想。

我們的雙胞胎倆感情頗好，在學校的老師也這樣說。這主要是內人惠美的功勞，她帶孩子有她的一套，這也顯示她實際且點子又多，她帶孩子的乾淨俐落，使她母親即我的岳母也佩服不已。

等岫安與岫寧長大後，因為孩子們成長的空間不足，故於一九六七年快年終



筆者美國房子的外觀。

時，我們經過慎重的考慮而買下了位於1600 Johnson Avenue的家。等她們長到兩歲時，惠美決定到喬大從頭開始在病理科受訓，於是請了當時還在世的二姊到美國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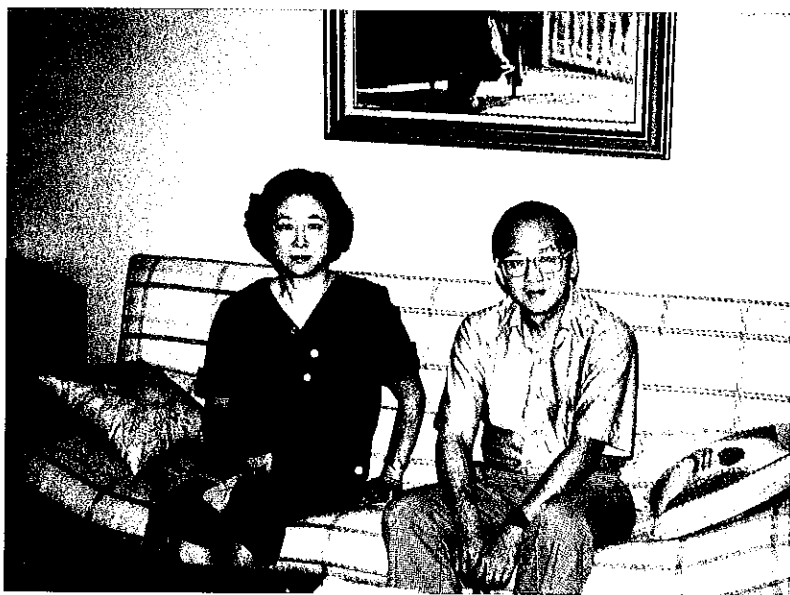
二姊嫁的夫婿陳萬生婚後一直體弱多病，最後患了肺結核去世，二姊未生育，平時自己一人生活，故請她遠赴美國來可觀光又可照顧女兒們，是一舉多得的事。於是惠美開始工作，而我託請二姊看管小孩的事也順利解決，這已在我的另一個回憶錄裡講過，故不在此贅述。不管怎樣，我在一九六三年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於一九六六年結束學程，獲得了博士學位。

成為美國公務員

我在成為喬大學生的同時也成了美國的公務員，這一件事使我益覺美國的制度也是講人情與裙帶關係的國家，和非法治國家一樣。

我拿的是學生護照，照理應該是絕對不能工作的，但我大概是有哥頓教授的護航，銓敘為第九等的公務員，一年的薪水是七千多，將近八千美元。我有一醫學系的同學張步良已來了美國數年，在華府當醫生，在我抵美時，他一年才僅有五千多美元薪水，所以他對我後來居上且多拿收入意見頗多是這個原因。

一九六三、六四年左右，也是越南戰爭戰事節節上升的時候，當時美國有醫師的徵兵制度，年齡上限達三十六歲，是比其他各領域都高的。有一天，美國當時的徵兵機關(Special Service)來了



右為張步良教授。

一封信叫我去巴爾的摩城做體格檢查，這明明是我觸犯美國醫師徵兵制度的結果，是徵兵的前奏。有綠卡沒有投票權，意味權利未全，但有美國公民的義務；我即把事情的始末告訴哥頓教授。哥頓教授建議兩件事：第一是要我遵從徵兵機關的建議，訪問徵兵機關一趟；第二是另外準備文件志願成為美國海軍士官（noncommissioned officer）。我照哥頓教授指示行事，到徵兵單位那裡，正有一位老太太在辦公接受我的案件；我告訴她我不是美國公民，她答：「我們會立即給你公民權。」我又說我也沒有臨床訓練及執照，她又答：「我立即給你訓練及執照。」

我不一樣的人生——黃崑巖自傳

我的兩個問題皆被否定，但最後她問我有沒有一年半的軍事訓練，我立即說有，她要我提出證明，因為美國法律規定，在二次大戰時的戰友國服務過一年半，每天有二十四小時軍事訓練的話，就免於徵兵。我立即寫信請惠馬上寄來退伍證，並請我駐美使館譯為英文，然後把這文件向美國徵兵機關提出。果然，這文件馬上奏效，我的體格檢查本來是最高的，馬上被改成免於徵兵的一類。我的朋友張步良因為算是華僑，雖然與我同期，但未去服第八期預官，所以第二次手握綠卡到了美國立即被徵兵而走了不同的路，但至少他服役時是美國的陸軍少校，而我還是中國的海軍少尉呢！這件事也彰顯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但像一個我拿學生護照卻能當國家研究所公務員的，在這法治國家是很明顯的矛盾現象。

成為美國公務員

——甘迺迪總統之死——

華府的十一月不是好季節，是風蕭蕭雨飄飄的秋末氣候，天氣常顯得陰霾，而一九六三年也沒有例外。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一個令美國國民悲傷的日子，我也無意中捲入了這風波。那

時我開始在喬大做助手幫忙教學，下午四點多鐘，我們整班學生（醫學系）皆在階梯教室上課，我坐在後排的「高地」，該座位恰好就在後門的附近。課進行到一半，突然後門開了，進來了一個名叫歐亨（Elisabeth O'Hearn）的女助理教授，她只隔空向我說了一句：“Kennedy was shot!”

我在上文已說過，台灣教的英文不管用，這裡又有了一個實例，通常「遇刺」都會說“assassinated”或“killed”，“shot”在醫學上是用來形容打針或種疫苗的。我只回答歐亨說：“Is that so!”，現在想起這事，當時歐亨一定會覺得我是一個無血、無淚又冷漠的華人男子。我當時也沒想到是我的英文程度不好，等兩、三分鐘後，華府各地的鐘聲大作，我才恍然剛才歐亨說的英文真意而覺得汗顏。

我每天都在十三街到二十四街之間上下班來回，總會經過白宮，因為兩端皆離白宮不甚遠。當時天空飄落的雖然不是雪而是細雨，但天氣不好，四點多鐘四周已初暗，白宮前來悼念的民眾已有很多，我也在白宮之前佇立許久。

甘迺迪總統才上任不久，就遇不幸，表明這個國家的安全措施有問題，而且也露出民主制度的破綻。我並不是稱讚獨裁政治的好處，而是強調推行民主制度也要更加小心。一個每人一票的制度難免有它的缺點，這也是法國大革命以來關心政治的人心中共同的隱憂，他們也提出過不少警告。

因此可見，世上沒有完全民主的國家。

但甘迺迪總統的口才、風度，在他在世時風靡了整個世界，就像現在民主黨初選中的歐巴馬（Barack Obama）一樣。優雅的第一夫人更與總統是天生的一對，這種魅力壓倒了古巴豬羅灣的攻擊失敗，以及他在內政方面國會空轉的挫折，而掀起了政治的一個新期望。據《華盛頓郵報》的專欄作家華特·利普曼（Walter Lippmann）的主張，甘迺迪最成功的是振興了經濟，在背後的可能就是甘迺迪的赤字政策，總統也不知它的究竟。反之他的出現代表了美國新時代的來臨。這樣的總統怎麼會遭到不測！

繼甘迺迪之後當總統的是本來當副總統的詹森（L.B. Johnson），他雖然標榜大而正義的社會，但他的任期卻為越南戰爭所困，成就不多，僅有的成就就是在黑人的民權運動。但他對國際學生的重視，使我有能以來賓身分進入白宮作客的經驗。

我也在寒夜中排隊排到半夜裡耐心等待，走入國會大廳去參觀覆蓋著國旗的靈柩，我也到阿靈頓公園觀看戴高樂等世界各國的領袖們來華府參與的送殯儀式，這些領袖一律也和其他人一樣徒步，經國會沿著賓州大道及憲法大道抵達阿靈頓。我總說沒有甘迺迪總統的美國頓失了一個活力。

——朱養民先生——

我至今很懷念朱養民先生，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國學究，任何人一見到他就會知道魯迅、老舍，甚至於我至今還欽仰不已的典範——前新竹中學的蘇森墉老師所描述的大陸學究，就是朱養民先生這個模樣。

我萬萬沒想到我會和他巧遇而成爲朋友，因爲我認定他是高攀不上的一個政論家，所以能遇上他，使我喜出望外。我在負責美國以前曾是雷震的《自由中國》雜誌的讀者，雜誌是在台灣發行的，胡適是發行人。朱先生在《自由中國》裡的文章字字真理，有理想的年輕人看了很容易上鉤。一九五〇年代該雜誌有一系列所謂反攻無望論，記得有殷海光與朱絆紆兩人以及其他幾個人的論文前後數篇；現在想起，如果那時政府放下身段，聽這些人的話而勵精圖治，立足台灣，我們今天的境遇不會落到這個地步。

我一九六三年到了喬大醫學院微生物學科，第一次上研討課，我就看到一位中國人，他中等身材，駝背，眼水溢出紅腫的眼框，鼻樑上懸掛著似要掉下的老花眼鏡，稀疏的頭髮摻雜著不少銀

絲。因同是東方人，我趨前自我介紹，略做寒暄之後，我才恍然這就是我曾拜讀過大作的朱絆紆，原名朱養民。後來和他有一番深交之後，知道了他的身世，又因爲他是外交出身，使得我在華府的駐美大使館結交了不少台灣的外交官，像彭啓平，以及文教處的鮑幼玉先生等都是好例子。

朱先生是在南京中央政治大學念外交，不久之後派往當時還有邦交的法國，在使館工作。他雖然中文不錯，但英文只能說馬馬虎虎，僅可溝通的程度。等法國與我斷交，政府要他轉到丹麥，他卻洗手不幹，自己轉往加拿大的溫哥華，再轉美國西雅圖開了雜貨店。據稱他在西雅圖遇搶兩次，第二次的黑人強盜居然被朱先生曉以大義而繳了械，朱先生因此遽然成爲媒體人物，還上了電視呢！我認識朱先生時他的英文溝通能力還很差，他是用什麼招數說服了那帶槍的大盜，對我來說仍是個謎，叫我想像那情景，似乎是一部叫座的喜劇片。

不知怎地，朱先生生涯有了大轉變，以五十左右之年他立志從ABC重新念起微生物學，拿了學士、碩士後，我在喬大遇見他時，是在他走入免疫學博士課程的時候。雖然他是免疫學的研究生，但我看他的心並不在自然科學，我們一坐下，他的話題必會立即轉入政治，而他在香港《明報》還常寫文章發表黨論。起初我發現他是極端反蔣擁毛的人，尼克森總統爲中美之交鋪路之後，

他立即訪問了大陸，而且前後還不只一次。有趣的是每次回來，他的言論就改變了一點。我知道他是信奉民主自由的中國人，這早就在我看《自由中國》雜誌文章時就一清二楚，直到有一天他坦誠地告訴我：「海峽兩岸都得痛罵，我是反對任何反民主政權的。」

朱先生外表很潦倒，喬大的科主任曾經跟我打開心窗說：「我一走，約翰（朱先生之英文名）是找不到工作的。」果然，主任一走，朱先生的位置就保不住，轉職到鄰州的杜邦公司做事而斷了聯絡。但他在政治立場上的凜然骨氣與手裡握的犀利筆桿子一直使我難忘，不知他現還是否在世。有一次他仔細地看我的長相，喃喃地說：「你的長相不錯，有做官之相，你要不要做官？要的話我願做你的代言人。」他的看法是：要做異議分子就要做得很壞，一定要坐牢，要這樣出名才可，坐完牢還可以寫一本書賺大錢呢！

——善行——

我曾在美國的公路上體驗過陌生人的善行而上了人生的一課。

一九六四年，秋高氣爽的九月，我帶著內人與女兒，開著一部剛買才一週左右的福特二手轎車，從華盛頓往巴爾的摩城，接新竹中學蘇森墉老師的女兒蘇綠萍來我家度週末。憑良心說，車子是買了，但我對維修車子的知識倒是空空如也，連說明書的封面都還沒見過就上了高速公路，擠入駕駛人的行列。



右二為蘇森墉老師長女綠萍。

去程安然無事，但回程卻在距離住家約三十二公里處，車子開始失控，整個車子偏向左邊。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車子導入右邊的路肩停了下來。下車一看，原來是左前輪爆了胎。但我當時對如何換胎毫無概念，就連備胎如何取出都有問題，考慮一番之後，只好取出褲袋裡的白手帕向過路的車子揮搖，希望有人下來救助。頃刻間，有部車停了下來，走下兩位身著筆挺空軍制服的軍官，問我發生了什麼事。當我說我不知怎麼換輪胎時，兩位軍官頗為訝異，臉上露出一絲「你這樣子

還敢上路」的表情，但兩人互相點了頭，就說：「我們來幫你，你看著喔！」說著，就把上衣脫下，捲起襯衣袖子，動起了手。他們步步為營，互相合作，一下子就把輪胎換好，並且把破胎放入行李箱。當他們說：「好了！可以走了！」我心裡感激得無法形容，傾囊使出還不是很流利的英文，謝了他們一番，目送他們開車離去。

目送行禮完畢，我以輕鬆的心情把行李箱碰地關上，到駕駛座想發動車子，才發現我的鑰匙忘在行李箱裡。顯然是開啓行李箱拿取備胎時，順手放在裡面了。你經驗過狼狽、困惑與進退兩難等情緒摻雜在一起的感覺嗎？我當時真的經驗過了！怎麼辦？我只好再把褲袋裡的法寶——白手帕拿出來再如法炮製一次。這次停下來的是白髮蒼蒼、風度絕佳的——對老夫婦，老先生問我：「怎麼了？」「我把鑰匙所在行李箱裡了！」「噢！你說什麼？」他起初還不相信呢！他抓抓頭，摸摸下巴，說：「有的車子把後座椅背移開，伸手可及行李箱，我們試試看。」他就親自動手和我一起搬動了後座，但我這一型車子在車廂與行李箱之間不幸有一鐵板隔開。老先生搖頭束手，他問：「你家裡有備用的鑰匙嗎？你家離這裡多遠？」聽我解釋說明後，他說：「這樣好了，你們現在統統坐我的車，我送你們回家，拿了鑰匙，我再載你回來這裡，好吧！」

老夫婦於是送我們回去，我拿了鑰匙，內人、岫清與綠萍留在家裡，他們把我一個人再送回原地。他總共開了六十多公里的路，再抵達現場時，已是夜幕低垂。你可有過對救命恩人感激不盡的感覺嗎？我有！老先生把我放下，說一聲再見並囑咐我開車小心，就很瀟灑且若無其事地掉頭要走了。我急忙說：「我要鄭重感謝你，但不知應該如何謝你？」他微笑地說：「不用謝了！下次你遇到別人有類似的困難，你就這樣子幫忙他就好了。」我站在原地揮別注視了他們許久，直到他車子的兩盞紅燈在夜色裡逐漸消失。

——論文作者的掛名——

我一直以為中國是禮儀之邦，結果不是，外國人看了不能瞭解的事很多，我認為中國的教育也走了樣，因為這種禮儀沒有在學校教，而失去了實際的教育效果，禮儀之邦也是嘴上說說而已。中國人在外國人深入的觀察中是很殘忍的，這種殘忍的程度沒因中國人對待中國人而稍減，讀者不信，可隨便翻翻外國人觀察中國人的書籍，這裡面包括最近問世的書——約翰·龐弗瑞特(John

Pomfret)的《中國的教訓》(Chinese Lessons: Five Classmates and the Story of the New China)。文化大革命的殘忍與亂像是一個好例子。

中國的教育沒有深化「先做成功的人，再做專業人」(Before becoming a doctor, become a man)的原則，一味地想學表面的技術，美其名曰學以致用。學以致用是清末民初中國面對西洋列強武力時的反應而延續下來的口頭禪，它是以學外國的船堅砲利為主體。社會上從事教育的關鍵人物如果不認為做人才是教育最重要的目的，如何做一個成功的人的教育就會在學以致用的口號下被忽略，我們的教育就是好例子。

我出洋相的糗事就發生在這一教育下，原來我寫的博士論文是七十五頁短小而精簡的，但為博士論文所投下的時間與精力非比尋常，所以博士論文非得在像樣的期刊上登載方肯罷休。我也就像寫博士論文般如法炮製，把我的博士論文寫成可以投稿的形式投到《微生物期刊》(Bacteriology)去。但問題是我把指導教授懷斯擺一邊，由我單獨掛名作者寫作。我在此告白，這事我在學校裡一點都沒學過，是言教或是身教？我笨到沒有領略，那時候也沒有所謂隱藏課程(Hidden Curriculum)這句話與概念，因此懷斯的名字只出現在謝詞中，現在想起這事真是汗顏。

待我一九六八年發現實驗用的小白鼠瘧疾能在白鼠身上刺激產生干擾素時，寫了一篇準備刊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的論文。一同參與這項實驗構想的哥頓教授向我說：「我的名字呢？我想我的名字應該在上面。」這時我才恍然大悟。

說我感覺遲鈍也可以，反正這是我們教育的結果，這事使懷斯教授顯得更偉大，因為他從不因此事吭聲，每次演講，講到登在我刊登論文中的數據時，他會說黃說怎樣怎樣，「以示公平」。

一、台、美記者的程度之別

一九六八年我在科學雜誌發表論文時，《紐約時報》的記者當天就打了一通長途電話過來，透過電話做了訪問，所問的問題內容程度都頗高，而且都觸及論文的重點。第二天《紐約時報》登的報導也真實地反映了我的意思，以及他在電話裡注入的意見，這使我很肯定該報辦報的精神與原則。

一九九七年加州大學舊金山校區的普西納因發現非病毒與非細菌的狂牛症新型病菌而獲得諾貝爾獎，當時台灣某大報派了一個人來找我寫關於普西納的故事。對方託我寫這篇文章時再三吩咐我



第三部

教職與學界發展

黃崑巖自傳

要寫得通俗一點，不然台灣的讀者看不懂。我這篇文章寫得很通俗，比起《紐約時報》的報導有天壤之別，結果文章寄出，雖翹首等待出現，但我的文稿卻像石落大海終未獲他青睞。過幾天原稿退回來，未刊登的理由是寫得太難了。這是台灣大眾媒體與彼邦程度有差，或純粹是媒體工作者的操作所致？

THE NEW YORK TIMES, SA

Potential Antiviral Agent May Also

By JANE E. BRODY

A natural substance under intensive study as a potential antiviral agent may also be able to protect against a host of other disease-causing organisms, among them the microbe that causes malaria.

A naval research team reported yesterday in the journal Science that the organism that causes malaria in mice was capable of stimulating the mice to produce the protective substance, called interferon.

The team — Dr. Kun-Yen Huang, Lieut. Warren W. Schultz, and Dr. Francis B. Gordon, of the National Naval Medical Center in Bethesda, Md. — said that their findings

and the recent findings of others indicated that interferon "possesses a wider and more complex spectrum of activity than is now understood."

A New York University research group reported recently that interferon appeared capable of preventing or delay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laria in mice.

When interferon production was artificially stimulated in the mice after they had been inoculated with the malaria organism, the mice were somehow protected against the disease, the New York researchers reported.

Other recent reports have indicated that interferon may

also ward off infections by such microbes as those that cause psittacosis (parrot fever), trachoma (a disease of the eyelids) and Rocky Mountain spotted fever.

All these microbes are parasites whose survival and disease-producing capacity depend on their ability to infect cells, a characteristic they share with viruses.

Their ability to stimulate interferon production offer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is protective substance may one day be useful in preventing and combating parasitic infections.

Interferon is a protein that the body's cells normally produce in response to virus in-

Hatfield Dedicates Library In Ohio to President Hayes

FREMONT, Ohio, Oct. 4 (AP) — Senator Mark O. Hatfield, Republican of Oregon, helped dedicate a library to President Rutherford B. Hayes today and said law and order was an issue when Hayes was in the White House.

"Law and order cannot be an instrument of hate and fear," Senator Hatfield said. "The poor

asked an opportunity to earn a good living in Hayes's days and even today some of them have been denied it."

Two new wings were dedicated at the Hayes Memorial Library and Museum. The original library was built in 1916

《紐約時報》針對當年筆者受邀至白宮的報導。

我不一樣的人生 —— 黃崑巖自傳